

武藤文庫所蔵早期北京官話資料概述及研究展望*

An Overview and Research Prospects of Early Beijing Mandarin Materials
in the Muto Bunko Collection

趙 葵欣

ZHAO Kuixin

要旨 本論は長崎大学武藤文庫所蔵の、明治初期の北京官話資料の紹介と概述をし、その北京官話研究や、外国語としての中国語教育研究に対する価値と可能性を検討する。武藤文庫の早期北京官話の資料から以下の2つを取り上げ、その内容や様々な記号、関連事情の解明に努めている：①御幡雅文の北京官話教科書の抄本3種：『紹古先生口授京話』（2冊）・『官話 志白問答』（2冊）・『官話 今古奇観』（1冊）。②イギリス John Bunyan の宗教小説 *The Pilgrim's Progress* の官話訳本『天路歷程官話』2種と、続編の『續天路歷程官話』1種。抄本は作成時期が1881年以前であり、編著者が旗人で、十分なデータ量があるという3つの特徴が見られ、19世紀の北京官話や北京語の通時的な考察に貴重な資料だと思われる。一方で英語小説の19世紀末の官話訳本は、現代中国語の「欧化語法」との関連性について考察する価値がある。本論でも語学と教育史の視点から、幾つかの研究例を試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 武藤文庫 19世紀の北京官話 中国語教科書 明治初期 中国語教育史

目録

零 引言

一 十九世紀末北京官話教材手抄本

1.1 《紹古先生口授京話》

1.2 《官話 志白問答》

1.3 《官話 今古奇観》

1.4 三本手抄本的相关考证

二 十七世紀英國宗教小說官話譯本

2.1 《天路歷程官話》5卷 1892年

2.2 《天路歷程官話》5卷 1919年

* 本文の研究契機来自大東文化大学大島吉郎教授慷慨共享的多种珍贵资料，特此致谢。

2.3 《续天路历程官话》6卷 1905年

三 其他汉语相关资料

四 研究示例和研究展望

4.1 语言本体研究角度

4.2 中文作为外语的教学研究角度

五 小结

参考文献

零 引言

武藤文库为武藤长藏(1881-1942)博士所收藏的资料,现藏于长崎大学附属图书馆经济学部分馆。武藤长藏教授出生于爱知县,从名古屋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现一桥大学)学习。1905年毕业后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就职,任讲师,教授经济原论·政策、商业通论、外国实践、货币论等课程。1907年回到日本,任职于刚成立两年的长崎高等商业学校,教授经济学史、银行论、交通论、殖民政策等,直至1936年退休。同年被授予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名誉教授¹。

武藤文库收藏有约一万册日本国内外的各种图书、杂志、小册子,以及约两百件地图、书画、陶器等。其中包含了经济学经典书籍、外交史资料、长崎地区相关资料等许多珍稀文献。武藤长藏先生是日本有名的经济学者、经济史专家,因此文库中经济学相关资料最为丰富,也很受关注,因此整理状况较好,现在可公开阅览的经济相关资料有45种。另外与近代长崎发展及历史相关资料也有17种已经电子化,在图书馆网站上公开,可供阅览利用。但是该文库中还有一部分与汉语有关的资料却未受重视,保存整理状况均不理想。这些资料不仅在长崎大学图书馆OPAC检索不到,甚至在长崎大学附属图书馆经济学部分馆1972年编写的《长崎大学经济学部所藏武藤文库目录》中也不见记录。只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编写,于1980年出版的《长崎大学附属图书馆经济学部分馆汉籍分类目录;熊本大学附属图书馆落合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中能看到一些。

经过笔者的实地考察,武藤文库里跟中文有关的资料从大的方面来说,至少包括三种:

1. 明治初期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手抄本教材; 2. 宗教小说的官话译本,甚至可以说是现在所知最早的欧洲小说官话译本; 3. 汉语其他方言、汉-满对照书籍。这些资料多为十九世纪末北京官话文献,极可能仅存于此,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非常值得关注。本文将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首先分类详细介绍这些文献资料的书影、保存状况、主要内容、语言特点,并对相关背景及书中记号等进行考证和解说,继而从多个研究视角,通过几个例子说明这些资料的研究价值,展望这些文献的研究可能性,还同时指出这些资料的整理和保护是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

¹ 武藤长藏先生的生平详见「武藤教授略年譜」『商業と経済』18(1):1-9页,1937年。

一 十九世纪末北京官话教材手抄本

武藤文库里有三种手抄本北京官话教材：A.《绍古先生口授京話》乾、坤共2册，御幡雅文手抄本；B.《官话 志白问答》乾、坤共2册，御幡雅文手抄本；C.《官话 今古奇观》1册，御幡雅文手抄本。这些资料虽然长崎大学图书馆 OPAC 检索不到，但直接询问图书馆的经济学部分馆，预约后可以在馆内阅览。另外，鱒澤彰夫（2018）是笔者所见最早介绍武藤文库里御幡雅文手抄本的研究²。以下根据笔者得实地调查，概述三种资料的书影、内容、语言等基本情况，并对资料中出现的相关人、物等做一些考证。有些调查结果与鱒澤彰夫（2018）的考察略有不同，一并指出留存。

1.1 《绍古先生口授京話》

《绍古先生口授京話》（以下简称《绍古》）中的“绍古先生”，即英绍古，又名绍古英继，旗人。是清末活跃在中文教育舞台的重要人物。但是关于他的记录不多，常被引用的是何盛三（1928：77）对他的介绍。英绍古是旗人，父亲曾官居高位，但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落。他入基督教成为了牧师，与洋人交往甚密。当时在北京学习中文的日本人大多得到过他及儿子恩禄的指教。比如中田敬义在北京留学时就是受教于英绍古，他的北京官话译著《伊苏普喻言》不仅有英绍古作的序，还得到其子恩禄的协助³。

1.1.1 书影、版式及藏书记号

《绍古》手抄本包括乾、坤两册。硬质厚封面、封底及扉页为暗红色花纹纸。乾册前有扉页，后无。坤册前无扉页，后有。

乾、坤两册大小不同。乾册外部整体书长 23.4cm、宽 15cm、厚 1.5cm。书脊以双横线划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书“绍古先生 口授京话”，中间部分写有“乾”字，下部为“御幡珍（藏）”⁴。皆为烫金楷体字。扉页右上贴有“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图书 LN06862 CL702 N019 2vols”标签。坤册外部整体书长 18.6cm、宽 21.5cm、厚 2cm。书脊部外观与乾册一样，双横线划分为三部分，上段书“绍古先生 口授京话”，中间部分写有“坤”字，下部为“御幡珍（藏）”，亦为烫金楷体。坤册封底前有与乾对应的彩色扉页。乾、坤两册均为竖排，右开本，没有页码。

乾册彩色扉页后有空白页，第一空白页左半部分有铅笔写的“会话”两字。空白第二页无字。空白第三页左半页上部有“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图书”的方形印章，下部有“御幡”的圆形印章。正文从第四页开始。正文第一页右上部写有“明治十三年十月初四课”，“课”字之下虫蛀，可能还有一字，也可能无字，难以判断。从正文开始，共 41 页。每页左半、右半各 9 列，每列 22 字。

² 鱒澤彰夫先生的博士论文（2018）于 2024 年出版。本文在引用研究结论时，如果两者无不同，则标注时间较早的 2018 年。

³ 英绍古之子恩禄后来以龚恩禄之名来日，1878-1880 年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任教。日本外交史料馆《官雇入表》（分类号 3.9.3.14、资料管理号 200-012159）留有相关记录。

⁴ “珍”字下贴有标签，故“藏”字不见，用（）表示。标签上印有“NHCS”。另一本抄本《官话 志白问答》的书脊亦是如此。但《官话 今古奇观》的书脊则没有这样的标签，烫金楷体“御幡珍藏”完整可见。

坤册第一页空白，左半页上部有“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图书”方形印章，旁边铅笔写有“会话”二字。第二页空白。第三页左边开始正文，正文第一页右下有一御幅雅文方形印章。正文部分结束后有两页空白，封底前有与乾册封面扉页花色相同的扉页。坤册正文部分共93页，每页左半、右半各13列，每列21-22字，篇幅比乾册大。坤册第48页右半页写有“明治十四季八月初八日于延旺庙街地藏庵抄完”字样⁵。但是抄本并未结束，此页以下还有45页正文。

两册抄本外观保存状况不错，但乾册内部虫蛀严重，不可读部分较多。坤本保存状态良好，几乎无虫蛀，清晰可读。只是有些书页互相粘连，翻页困难。

1.1.2 《绍古》红色标记解读

《绍古》手抄本均以黑字楷书抄写，但有很多红色标记，比如红色圆圈、逗点，字上红色斜线，页眉红色批注等。初步考察各种红色记号的意思如下：

A. 字上右斜线表示送气音。如：可。有的字除了划右斜线，还直接在右边红笔写出“气”字，如“假充有学问的人、一片婆心”（乾9-a）在“充、婆”字右边写有“气”字，表示送气音。

B. 字间右下“、”表示断句，相当于现在逗号、句号、问号等标点符号。如“没有携着来、就是兄弟一个人在这儿、府上是在那儿、……”（乾1-a）

C. 字旁红字注释有多种情况。有的注音，如“鸿材（乾9-b）”的“鸿”字右边红字标出“音红”；乾册10-a页眉红字写着“斥，音匙去声”。有的注表示有两种说法，如“再者还有小心”“有”字右边写“或要”（乾9-b）。有的解说词义或写出类义说法，如“想来阁下慷慨为怀（乾14-a）”在“慷慨为怀”右边红字写有“热心肠儿的人”。有的是修改，如“克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坤8-b）”的“克”右边红字订正为“古人”（正：古人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

D. 字右边红色圆圈表示俗语、惯用语。如“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上行下效、人生有酒须当醉（坤8-b）”这些词右边都画有小红圈○，表示是一个俗语。

除此之外，句子与句子之间有时出现红色“ㄣ”标记。现阶段笔者推测这一符号可能是划出学习进度。因为整个抄本没有分章节，学习到何处有可能需要自己做出记号。

1.1.3 《绍古》构成形式、内容及语言

手抄本《绍古》乾、坤两册均以甲、乙两人对话形式行文，不分章，也没有标题。人物设定甲，姓章，行五，故称章五兄，山西太原人，刚上京不久。乙，姓文，行二，故称文二兄，家居前门外茶食胡同，供职于工部衙门。全书以甲向乙讨教为线，从说明京城的社交礼仪习俗开始，话题涉及饮酒赴席的规矩、酒席上的各种言辞对应、去做客谈家常、送礼、拜

⁵ 本文引用抄本原文时一般改为简体字，但有些字形保留了原文，如此处的“季（年）”、下文1.4.1中的“榧（杂）”（p.9）等。罇澤彰夫（2018、2024：117）此处均转写为“明治十四季”，有误。《绍古》原本无页码也不分章节，出处页码以笔者現地调查或资料整理后的页数为准。以下引用例句时书名、册名后的页数也是如此。每页右半页表示为a，左半页表示为b。

另，此处提到的“延旺庙街地藏庵”，现为北京宜南地区迎新街。迎新街是1965年改的名，原名阎王庙街，又以谐音改为“延旺庙街”。这是条古街，会馆、寺庙云集，阎王庙、地藏禅林、云南会馆等均很有名。

托别人办事、官场应酬。然后延伸到介绍内外衙门公事例章、朝廷的各种制度等，特别谈到六部公事后，开始宣讲朝廷旌表之事。到此乾册完。坤册的内容涉及科举、礼部负责举行的陵寝奉祀活动、民间百姓的祭扫习俗、除夕辞岁习俗、婚丧嫁娶的程序、礼节等。

抄本语言文白程度有异，关于日常生活、交际的会话内容，语言平白，是比较典型的白话形式的北京官话。但是内容从一般生活延伸到朝廷内外衙门公事例章以后，语言文言色彩比较重。比较乾本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语言如下⁶：

(1) 甲：贵衙门是忙得很哪。

乙：兄弟不过是初到衙门学习当差，没什么忙的。

甲：吾兄在这儿有什么公干？

乙：没什么，见天也就是自己用用工，有朋友来了讨讨教，可以得些个进益。

（《绍古》乾 1-a）

(2) 甲：小弟听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若如阁下所言，似乎此等尽孝之道未免失乎中道了。

乙：兄台所说固然不错。此等尽孝之人，虽似有伤遗体，然苍天鉴其诚、朝廷怜其孝，所以一概命礼部核议给与旌表，以为劝化人民，尽孝之一端耳。（《绍古》乾 41-a）

例（1）是日常生活对话，相当口语。而例（2）是在讨论朝廷礼部的旌表制度，措辞文言色彩相当重。因此在研究该抄本时要注意区分两种语言，不可一概而论。

最后，两册抄本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均显示出由易而难的特点，对话句子的长度也是逐渐增长，坤册语言水平较高。

1.2 《官话 志白问答》

1.2.1 书影、版式及藏书记号

《官话 志白问答》（以下简称《志白》）也是乾、坤两册，外形尺寸大小一样。硬质厚封面、封底，长 18.3cm，宽 22cm⁷。扉页纸张颜色花纹同《绍古》。两册前后均有扉页。书脊装帧也跟《绍古》一样，以双横线划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无字，中段写“官话 志白问答”，下部为“乾 御幅珍（藏）”和“坤 御幅珍（藏）”，烫金楷体字。两册抄本均为竖排，右开本。外部破损严重，乾册书脊已经脱落。但内部文字保存完好，清晰可读。

乾册每页左半、右半各 13 列，每列 20 字，正文部分共 194 页。正文后有空白两页，然后是封底。首页从左半页开始第一章，“第一章”三字上盖有“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图书”椭圆形印章，下有“鹤江御幅”方形印章。

坤册亦从左半页开始，第“百六十五章”几个字右边盖有与乾册第一页一样的印章——“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图书”，椭圆形。坤册每页左半、右半各 13 列，每列 20-24 字不等，正文部分共 170 页。封底前无空白页。

⁶ 抄本以红色“、”句读，引用时为阅读方便均改为现代标准语的标点符号。下文同。

⁷ 关于该书的尺寸，笔者实地测量结果与罇澤彰夫（2018：72、2024：117）记录不同，原因不明。

《志白》分章节，但无页码，共二百八十五章。乾册从第一章至第一百六十四章，又分为四个部分。49-a 写有“第一本三十五章止”；97-b 写有“自三十六至七十六章止”；144-a 写有“自七十七章至百十九章止”，后有一空白页。从 146-b 开始第一百二十章，最后 195-a 写“第肆号 自百二十章至百六十四章止”。

坤册从第一百六十五章开始至第二百八十五章。也分为四个部分。1-b 开始第一百六十五章，49-b 第二百零二章结束后，一页空白。51-b 开始第二百零三章，但无乾册那样的说明文字。98-b 第二百三十三章结束后也是一页空白。100-b 开始第二百叁拾肆章。后面第三、四部分的分离处也是如此，以一页空白隔开，无说明。第三部分从二百叁拾肆章到二百六十七章，最后第四部分从二百六十八章至二百八十五章。二百八十五章结束处写“大终”二字。

1.2.2 抄本红色标记解读

《志白》手抄本也是黑字楷书抄写，红色记号仅有两种：字间右下“、”表示断句；字上红色点表示修正。

与《绍古》相比，红色标记要少得多，特别关于发音的注释完全不见。这可能是因为御幅雅文的汉语水平提高了，不再需要语音方面的标注。从《志白》内容的难易程度也可以看到，这应该是汉语水平更高阶段的教材。参见下文 1.2.3。也有可能这是阅读教材，对诵读没有要求，所以学习时也不需标注送气音、重音等。

1.2.3 《志白》构成形式、内容及语言

《志白》的体裁也是对话，人物设定主角两名，一位是来华不久的英国人——白老爷(Mr. White)，一位是在兵部捷报处当差的秀才志文(号富斋)。全篇主要是这两个人物的教-学对话，也穿插了一些白老爷与志文秀才的朋友、志文与白老爷仆人的对话，但所占比例极少。发话人以“白(白老爷)、志(志文)、仆(仆人)”等表示，但最开始没有交代人物姓名时，用了“甲、乙”表示不同说话人。

全篇内容以英国人白老爷跟秀才志文学习时事，读《京报》⁸为线，从讲解《京报》每天的内容、朝廷政务等开始，详细介绍、说明了清朝政府衙门的组织结构、科举考试的具体方式、日程甚至当年的主考官等。由此话题延伸到清朝历史上与边疆民族的各种事务，比如乾隆年间发生在新疆、回疆(回回人)的战乱。用最后一章(第 285 章)的话来说，“这个事情本来是乾隆年间头一件大军务”，所以是个“大题目，说着费事。后来无论再说什么，都没这样的大题目了”(坤 170-a)。

整本对话经历了从春天至次年夏季的一年多时间，因此谈论中还穿插了各个季节里朝廷及民间的各种节日活动、风俗习惯、燕京八景、当时轰动一时的各类新闻等。可见这本教材从内容上来看非常特殊，不仅有清末官场、社会生活的时事，更涉及清朝军事历史。讲述语言虽然不难，但内容复杂，整体难度比较大。这些清末旗人自己讲述的历史资料非常宝贵，而且这些内容随着清朝的灭亡，也不再出现在以后明治时期的汉语教材中。因此这一特殊教

⁸《京报》是清朝在北京出版的半官方中文报，也称“邸报、邸抄、京抄”。由官方特许经营的报房投递。《京报》以登载政府公告为主，包括中央政府朝廷的活动、皇帝旨意、大臣上奏文等。是清代官僚、知识分子以及在华传教士、外交官等了解中央政府情报和社会状况的重要手段(殷晴 2018)。

材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尚未被关注很是可惜。

1.3 《官话 今古奇观》

武藤文库里的这个手抄本《官话 今古奇观》（以下简称《今古》）并非广为人知的金国璞《北京官话 今古奇观》，因为内容与金本完全不同，时间也早于金本，详见下文 1.3.3。

1.3.1 书影、版式及藏书记号

《今古》手抄本 1 册，红色硬质厚封面、封底。整体外观长 18.6cm，宽 21.5cm。书脊装帧形式同《绍古》和《志白》，双横线分割为上中下三段，上段无字，中段“官话 今古奇观”，下段“御幡珍藏”，皆为烫金楷体。封面后有扉页，纸张花色也跟《绍古》和《志白》一样。封底处无扉页。第一页正文从左半页开始，题目“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之上有“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图书”方形印章，同页右下有“御幡”圆形印章。抄本整体保存状态很差，封面、书脊已脱落。正文纸张虫蛀厉害，多处字迹无法辨认。而且抄本中间多处前后页面相互粘黏，无法分开翻页，因此几乎可以说是已经处于无法阅读的状态。

抄本竖排，右开本。每页左半、右半各 15 列，每列 20-22 字。一个故事称为“一本”，如，第一个故事结束后，写有“第一本毕”字样。整个抄本没有连续页码，但每个故事之内在左半页用红笔写有“一葉、二葉……”页码。抄本共六个故事：①庄子休鼓盆成大道，11 页。②裴晋公义还原配，11 页。③转运汉巧遇洞庭红，19 页。④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只能勉强看到标题页，以后及故事 5 和故事 6 调查时已经不能翻页，无法查看。根据鱒澤彰夫(2018)的记录，抄本的第 6 个故事为“苏小妹三难新郎”。

1.3.2 抄本红色标记解读

《今古》亦为楷体黑字抄写，有三种红笔记号：

A. 字间右下“、”表示断句，相当于现在逗号、句号、问号等标点符号。如“这本地又没有认识的朋友、可以挪借些个钱、莫非我要饭上京去么、……（故事 2 第 6 页）”

B. 字上右斜线表示送气音。如“这本地又没有认识的朋友、可以挪借些个钱、莫非我要饭上京去么、……（故事 2 第 6 页）”中的“瓶、可、钱、去”。

C. 字上短横线表示词或句重音所在之处。如“却说唐朝、有一个人、名字叫裴度（故事 2 第 1 页）”中的“唐、人、度”。

D. 此外还有红笔注释，包括注字的读音，如“糊里巴涂（故事 2 第 6 页）”的“糊”字旁写“音屋”；修改补漏，如“拄着杖起那边儿来了（故事 2 第 6 页）”在“杖”字上边红笔加写“拐”等。

1.3.3 《今古》构成形式、内容及语言

《今古》抄本全篇为短文叙述体，共收录六个改编自明代抱瓮老人编著的《今古奇观》的故事，具体如下：

①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明《今古奇观》第二十卷⁹。

②裴晋公义还原配，明《今古奇观》第四卷。

⁹ 本文所用《今古奇观》为抱瓮老人辑、顾学颜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③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明《今古奇观》第九卷。

④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明《今古奇观》第十三卷。

⑤不明

⑥苏小妹三难新郎，明《今古奇观》第十七卷。

而金国璞所编《北京官话 今古奇观》内容与手抄本完全不同。金国璞《北京官话 今古奇观》第一编出版于明治 37 年（1904），文求堂刊；第二编出版于明治 44 年（1911）文求堂刊，两编收录的四篇小说为：①李汧公穷邸遇侠客；②十三郎五岁朝天；③沈小霞相会出师表；④怀私怨狠仆告主。

至于两种《今古奇观》孰先孰后，本文认为御幡雅文的手抄本要早于金国璞的出版物，因为这一手抄本应该是御幡雅文留学北京期间所抄，所以不会晚于 1881 年（详见下文 1.4）。不过这一抄本是有已经成书的原本还是只是课堂讲义，现阶段无明确资料和记录可以证明。本文认为课堂讲义而未成书或公开出版的可能性大。

抄本《今古》虽不是对话型文本，但整体上口语化色彩很浓，比如“赶过了些日子，裴度又遇见先头里那个相面的了（故事 2 第 1 页）”、“这么着他就坐在道旁边儿，想了会子又哭，哭了会子又想（故事 2 第 6 页）”。该抄本比金国璞编写本早了二十多年，进行语言比较，也许可以帮助确认作者。

1.4 三本手抄本的相关考证

以上这三本手抄本装帧一致、字体也一致，可以认为是一人所抄。三种资料各本书脊均写有“御幡珍藏”，书内也有御幡雅文的个人印章，因此鱗澤彰夫（2018、2024：116-118）认为这些是御幡雅文的手抄本。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是可信的，而且认为这些抄本是御幡雅文在北京公使馆留学时使用的教材，也是他的学习笔记。以下从御幡雅文学中文的经历、留学时间及明治初期日本公使馆教授北京官话的状况等方面来证明。

1.4.1 御幡雅文简历¹⁰

御幡雅文（1859-1912）安政 6 年出生于长崎。幼时在长崎传统的“汉学塾”学习，16 岁来到东京，先跟随唐通事世家出身的吴来安先生学了差不多两年唐话（南京音），明治 9 年（1876）2 月作为官费生进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学科学习。明治 9 年 9 月东京外国语学校从南京话转而学习北京官话，因此御幡雅文也从 9 月开始跟随北京来的外教薛乃良先生开始了北京官话的学习。所用教材主要是英驻华外交官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还有薛乃良先生自己编写的一册《眉前浅话》。但《语言自述集》是高价之物，薛乃良先生的自编教材也未见出版，因此这些课本都是通过抄写来学习的（六角恒广 1999：141）。收入波多野太郎编·解題（1988）第 1 篇第 2 卷的《眉前浅话》（白温卿藏）就是手抄本，可为证。明治 12 年（1879 年）10 月，御幡雅文申请了陆军参谋本部在该校汉语学科招募的北京留学，并于同年 11 月底到达北京公使馆开始了留学生活¹¹。

¹⁰ 御幡雅文简历参考了六角恒广（1999：127-176）、鱗澤彰夫（2018、2024：112-144）的研究成果。

¹¹ 明治 4 年（1871）清政府与日本正式建交，明治 7 年（1874）在东单牌楼六条胡同设立了北京公使馆。与清政府的正式建交，促进了日本对北京官话人才的大量需求，北京公使馆也成为日本中文教育由南京

御幡雅文在北京公使馆学习了两年(1879-1881),于明治14年(1881)12月回到日本(六角恒广1999:146)。明治15年(1882年)御幡雅文赴任熊本镇台,在军队里负责教授北京官话。并同时在私立学校济々黉授课。明治22年(1889)就任长崎商业学校,明治23年(1890)受荒尾精之邀去上海,在“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教北京官话。明治28年(1895)从军赴台湾总督府任职。明治32年(1899)从台湾退職到上海,出任三井书院讲师。1901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成立时,御幡雅文兼任了该院中文讲师(六角恒广1999:166)。但1902年他辞去了东亚同文书院工作,仅在上海三井书院任教,一直到1910年因病离开上海回长崎,1912年在长崎去世。

御幡雅文一生出版了很多汉语教材,除了北京官话教材,还有上海话教材。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华语跬步》系列(1886未完稿版、1890第2版、1901第3版、1908增补版)。其他还有如《官商须知文案启蒙》(1892)、《沪语便商》(1892)、《生意裸话》(1892)、《台湾土语读本》(1897)等。在当时“支那语”界有“北に鄭あり南に御幡あり(北有郑氏,南有御幡)”的说法¹²。

1.4.2 明治初期北京公使馆的中文教育情况

日本的中文教育,有一个从南京官话到北京官话的转变,而御幡雅文正经历了这个转变期。他在北京公使馆留学期间,日本的中文教育界还没有自己的北京官话教材,用的仍然是《语言自述集》,另外也使用了先生自编的一些教材。学生自己抄写的方式也没有改变。

当时北京公使馆的中文教学方式,并非班级授课,而是类似家庭教师的个人教学(中田敬义1942)。御幡雅文师从长白桂林¹³,同样来自东京外国语学校的中田敬义师从英绍古父子(中田敬义1942),作为翻译实习生(通弁見習)的吴启太则跟着金国璞、黄裕寿先生学习(六角恒广1999:143)¹⁴。因此认为《绍古》这个抄本就是英绍古的讲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绍古》乾册正文第一页页眉写有“明治十三年十月初四课”,坤册48-a写有“明治十四年八月初八日于延旺庙街地藏庵抄完”,也与御幡雅文在北京公使馆留学期间(1879-1881)完全吻合。其他两本手抄本也应该是这期间使用的教材,同时也是他的学习笔记。但原作者待考。

从这次武藤文库里发现的手抄本《今古》可知,将明代短篇小说《今古奇观》改编来作北京官话的教材,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就已经开始了。后来金国璞继续使用这种改写小说作为中文教材的方式,最终出版了现在广为人知的《北京官话 今古奇观》两编。其实,《今古奇观》在唐话教育时期,就已经是唐通事们必读的教养书了(六角恒广1984:45)。中田敬义也曾写到明治六年(1873)自己在汉语学所,就是用《今古奇观》来学汉语的(中田敬义1942)。

官话向北京官话转型期的教学大本营。中田敬义、吴启太、颍川高潜、平岩道知等都曾在此学习。

¹² 北的“郑氏”指北京公使馆的郑永邦,《官话指南》作者之一。

¹³ 长白桂林,又称桂林,满族人。井上哲次郎(2003:327)的自传里,有井上1887年10月-1890年7月在柏林大学东语学堂期间与桂林相识的记录,而且说桂林曾在日本外国语学校任教。那么,这应该就是明治15年5月至明治17年7月(1882.5.4-1884.7.18)受聘于东京外国语学校的关桂林。关于关桂林受聘于东京外国语学校的资料参照六角恒广(1988:153-154)。

¹⁴ 中田敬义明治9年(1876)到北京公使馆学习北京官话,明治14年(1881)1月离开北京回国(中田敬义1942)。所以他和御幡雅文是同一年回日本的,只是中田敬义在年初,而御幡雅文是在年底。

可见,日本中文教育界对《今古奇观》的利用由来已久。

武藤文库这三种抄本装帧一样,《绍古》与《今古》的图书馆印章及御幡雅文的印章也一样,《志白》的两种印章稍有不同。再从抄本里的红笔标记来看,《绍古》与《今古》除了句读符号,还有送气音的标注、难字注音,标注词/句重音等。而《志白》只有句读,无读音方面的标注。所以本文推测御幡雅文的学习顺序是《绍古》与《今古》→《志白》,这和三种抄本内容的难易程度也是一致的。

最后来看看御幡雅文与武藤长藏的交集。武藤长藏 1905-1907 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讲师,此时御幡雅文也在上海,在三井书院任教。而且御幡雅文是东亚同文书院成立时的讲师,只是 1902 年辞去了该处的工作。1907 年武藤长藏到长崎高等商业学校任教,以后一直在该校工作到退休。三年后 1910 年御幡雅文也回到故乡长崎,一直到去世。这是两人在上海和长崎的交集,这大概就是这三本手抄本为何在武藤文库的原因。

二 十七世纪英国宗教小说官话译本

武藤文库里有早期宗教小说《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的官话译本两种——《天路历程官话》(两个版本)及《续天路历程官话》(一本)。《天路历程官话》两个版本记录在“长崎大学武藤文库和装本”目录“712 英文学”(p.95)里,《续天路历程官话》记录在同目录“903 基督教”(p.98)里。

《天路历程》是英格兰作家、布道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著作,于 1678 年 2 月出版,基督教小说。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英国文学作品之一,被翻译成 200 多种文字(W.R. Owens, ed. 2003: xiii; F.L. Cross, ed.1983: 1092)¹⁵。陈平原(2003)指出《天路历程》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英国长篇小说”。早在 1853 年,英格兰长老会的首位宣教士宾为霖(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又译宾惠廉)就将《天路历程》翻译成了汉语文言文。1865 至 1866 年间,他又将其译成官话白话文。该书还有闽南话(1853 年)、宁波话(1855 年)、福州话拼音(1855 年)、广东话(1870 年)、上海话(1895 年)译本。《天路历程》被认为是第一部采用白话翻译的西方文学名著(吴文南 2008)。武藤文库的两种藏本如下:

2.1 《天路历程官话》5 卷 1892 年

光绪 18 年(1892)天津华北书会(North-China Tract Society)版。

线装本,封面破损,但版权印刷页清晰。封面、封底纸张与里面正文无异,纸张很薄,印刷版。书外观长 19.5cm,宽 13.5cm。

有序言两篇,首先是天路历程原叙,其次是天路历程官话自序¹⁶。两序均无署名,自序写有时间“同治四年乙丑季夏中旬书于京都客舍”。全书竖排,右开本。每页左半、右半各 13 列,每列 31 字,无插图。5 卷,共 84 页。句读以右下角“、”表示。注释用双排小字夹在正文之间。书中人物姓名以旁划竖线表示。

¹⁵ W.R. Owens, ed. (2003: xiii) 原文如下: ... the book has never been out of print.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innumerable editions,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over 200 languages.

¹⁶ 此处“原叙、自序”文字照录原文。下文同。

2.2 《天路历程官话》5卷 1919年

民国8年（1919年）上海美华书馆排印本。

线装本。外部保存较好，书脊处有破损。封面、封面纸张与内无异。纸张很薄，印刷版。书外观长25.5cm，宽15cm。也有两篇序，但“自序”在前，“原叙”在后，顺序与光绪十八年版本相反，序文内容一样。竖排，右开。每页左半、右半各15列，每列34字。共5卷，68页。有插图。句读也以右下角“、”表示，书中人物姓名也是旁划竖线。但这个版本的注释有两种，一种在每页上面页眉处，这是对文中词的隐含义的解释，如行文中有“传道”一词，页眉写“传福音道理之人”。另一种是用小字写在正文文字的右边，标注的是可以参见圣经的哪些部分。如“死后必受审”右侧用小字写着“见希伯来九章二十七”。查看圣经希伯来书九章第二十七句，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一标注上面的1892年版不见。

关于《天路历程》的北京官话译本，笔者所知主要有以下几种：

1865年版（同治四年），藏于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柏林国立图书馆）和Bodlerian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Oxford（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这是官话译本的初版。

1869年版 藏于Bodlerian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Oxford（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

1872年版，藏于Bodlerian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Oxford（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

1892年版，藏于长崎大学附属图书馆经济学部分馆

再晚一些有1906年、1914年、1917年、1918年、1919年、1933年版等。这些版本的具体情况均不明。

提到武藤文库所藏的这两个官话版本的，只有樽本照雄（2002）《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吴文南（2008）的博士论文引用了樽本的目录，但没有任何介绍，似乎他并没有见到这两本书。

2.3 《续天路历程官话》6卷 1905年

光绪31年（1905年）上海美华书馆排印本，全6卷。

线装本。无特别装帧的封面。封面纸张与书内无异，纸张很薄，印刷版。书外观长25.5cm，宽15.5cm。外部破损较多，但正文清晰。无序言。无插图。竖排、右开。每页左半、右半各15列，每列34字。6卷。每卷都从1开始计页数。卷1有8页+右半页。卷2有9页+右半页；卷3有10页+右半页；卷4有10页+右半页；卷5有8页+右半页；卷6有9页+右半页。无封底。最后一页左下小字写有“续天路历程官话卷六终”。

《续天路历程官话》（6卷）的第一版出版于同治5年（1866），有京都福音堂版本。藏于Bodlerian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Oxford（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与武藤文库所藏版本关系待考。

三 其他汉语相关资料

除了以上这些北京官话资料以外,武藤文库里还有一些唐话、满语及汉语方言资料。主要有下面三类。

3.1 《长崎大学经济学部所藏 武藤文库目录》(1972)和装本部分的其他中文资料¹⁷

①[700 语学总记] 唐訳便覧 4-5 卷,岡嶋璞(冠山),洛東 有門庵藏,25 页,和装本。资料号 700 M16。

②[702 发音 会话] 清文補彙 卷 5,51 页,和装本(虫蛀、破损),资料号 702 M9。

③[702 发音 会话] 滿漢六部成語 1-6 卷,缺卷 3,共 5 册。和装本,资料号 702 M12。

④[705 读本] 唐訳便覧 1-3 卷,岡嶋璞(冠山)編,享保 11 年(1726 年),3 册。和装本,资料号 705 M6。

⑤[705 读本] 唐語纂要 1-6 卷,岡嶋援之編,京都 出雲寺和泉掾,享保 3 年(1718),6 册,和装本,资料号 705 M2。

⑥[706 字典] 唐語便用 岡嶋冠山 植村藤三郎,享保 20 年(1735),1 册,和装本(虫蛀、破损),资料号 706 M29。

3.2 《长崎大学经济学部所藏 武藤文库目录》(1972 年)洋装本部分的其他中文资料

⑦ [700 语学总计] 滄語初学課,上海:上海美華書館,光绪 29 年(1903),45 页,资料号 700 M10。

⑧ [705 读本] 華語萃編 初集,東亜同文書院編,上海:東亜同文書院,大正 6 再版(1917 年),146 页,资料号 705 M3。

⑨ [705 读本] 支那時文教本,井上翠編,東京:文求堂,大正 10 年(1921),147 页,资料号 705 M1。

⑩ [705 读本] 標準華語会话教本,林盛遠、曹夷仁共著 大連 大連工業学校校友会,昭和 13 年(1938),129 页,资料号 705 M4。

3.3 “武藤文库 全文阅览可能资料·新发现资料目录”里的相关资料

“武藤文库 全文阅览可能资料·新发现资料目录”是长崎大学附属图书馆经济学部分馆在网站上对外公开的电子扫描资料,这里面有一些汉-满对照文献,简单整理如下。其中有一处说明不确,也一并指出。

⑪ 清文補彙 卷之式:目录编号 No. 400 / 文献·辞書等-漢文·女真实文字

⑫ 清文補彙 卷之肆:目录编号 No. 401 / 文献·辞書等-漢文·女真实文字
文言、满语,年代不明。

⑬ 一学三貫 清文鑑第二卷:目录编号 No. 402 / 文献·辞書等-漢文·女真实文字
文言、满语,年代不明。

⑭ 聖諭広訓:目录编号 No. 403 / 文献·辞書等-漢文·女真实文字

¹⁷ 这一部分所列文献书名、作者均用日语原文以便查找核对。目录中有的名字后写有“编”,有的无,均照录。

康熙 61 年（1722 年）版。文言、满语。

⑮（女真文字漢文對訳書）：无书名，目录编号 No. 404 / 文献・辞書等-漢文・女真実文字。一册，年代不明。北京官话白话文，满语。

这个网页上没有写出书名的资料⑮，书的封面上其实有满语“百条”字样¹⁸。不过该书虽名为《百条》，但内容与乾隆年间编写的满语口语教材“一百条”系列完全不同。全书为竖排，左开。第一页左下有“武藤藏书”印章。每页从左向右排列，先列满文，满文右边是相应汉语。正文共 66 页。无句读，句子与句子之间以空白隔开。

从汉语部分来看，该书的语体色彩是相当口语的。全书尽管未设定人物，也没有分写角色，但明显是家常对话。比如第 2 页内容如下（仅转写汉字部分）：

门口什么人叫唤 咱门家的叭儿狗子咬了隔壁子猫了 他们家的小子 叫赔猫
他是小孩子家人知道什么你们拿好话哄着他 打发他去就完了

显然是两个人的对话，而且貌似主仆关系。一人（主）问“门口什么人叫唤”，另一人（仆）回答，说明了事情原委，继而发话人（主）吩咐如何处理。

长崎大学图书馆网站上对此书的备注“劈頭は「誠心宮財從何而得」、本文最終頁に武藤蔵書印、裏表紙に女真文字有”不确。有印章的是第一页，而所谓“劈頭は「誠心宮財從何而得」”其实是最后一页。大概是因为本书虽为竖排，但其实是左开本，而整理人以为是右开，所以前后弄反了。另外，说明文字亦有误，“宫财”应为“官职”二字，原文的“戢”是“职”的异体字，非“财”。最后一页原文汉语转写如下：

如今的人 那一个不好功名 不要得官衔 誰其那们说
国家俸禄钱粮没有白给人吃的理 倘若书上不用诚心 官职从何而得

还要指出的是，此处目录上写着“女真文字汉文对译书”，不过这里的女真文其实指的并非在契丹和汉字的基础上创造的女真文字，而是在蒙古文基础上创造的满文¹⁹。

以上所列举并做了概述的各类文献并不一定完全覆盖了武藤文库的收藏，一来受限于笔者的时间和研究兴趣，二来武藤文库所藏文献资料十分丰富，本文仅为笔者调查所见。

四 研究示例和研究展望

武藤文库中的这些早期官话资料均尚未引起足够关注，亦未见有具体、深入的研究成果。而文库里的有些文献，比如手抄本《官话 今古奇观》已经虫蛀、破损严重，难以阅读。如果不尽快加以修复、整理，以后就可能再也无法看到了。所以下面以十九世纪末的北京官话资

¹⁸ 书名满语的解读得益于大东文化大学杨璇老师的帮助，特此致谢。

¹⁹ 女真文创制于 12 世纪金朝建立后不久，元灭金后几乎就不再使用。参见《金史·列传第十一》。（<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270779&remap=gb>）。

料为中心,从语言本体研究和中文作为外语的教学研究两方面讨论这些资料的研究价值和研究可能,希望引起方家注意,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和深入研究。

4.1 语言本体研究角度

从语言本体研究角度来看,这些资料对北京官话的历时研究、早期白话文的欧化语法问题研究均有重要价值。

4.1.1 早期北京官话研究方面

首先,早期北京话是否等于早期北京官话²⁰。这两个概念现在并没有严格区分,但是不一定就意味着是两者所指相同。这有些类似现在北京话与普通话的关系,不过因为现代汉语普通话有明确的人为规定痕迹,可以将两者分开。但是晚清的北京话与北京官话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尚需探讨。可以说至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是语料问题。

在日本中文教育从南京官话向北京官话的转型期,是以旗人的北京话为正宗的,这从北京公使馆及所聘请的中文教员差不多都是旗人可见一斑。武藤文库里的这三种手抄本,《绍古》无疑是旗人北京话以外,御幡雅文在北京留学期间是师从长白桂林(旗人)的,因此《志白》和《今古》也可以认为是旗人的北京话。那么这些文献里面的词汇、语法特点,与其他北京官话文献,比如外国人编撰的各类北京官话课本,如《语言自述集》(第一版)、《官话指南》(第一版)等比较,可能会对早期北京话与早期北京官话的认识有些帮助。至少这样的工作目前尚未做过,有优质的语料的话是应该考察的。但现有研究均未明确区分两者,因此下文在进行现有研究回顾时也不作区分。

现有早期北京官话研究,太田辰夫先生是先行者,他以《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为始,而后《小额》、《北京》,后来也利用了《官话指南》(九江书局版)、《官话类编》这类汉语教材。其后,日本学者一直关注各种北京官话教材、官话正音读本、满汉合璧文献等,对早期北京官话的研究颇丰。近年来中国国内早期北京话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不仅有对早期北京话各类教材的整理出版,也产生了早期北京话研究专著,王洪君、郭锐、刘云总主编的“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为其代表。但是,无论是波多野太郎编撰的《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系列(1984、1985)、六角恒广编撰的《中国语教本类集成》系列(1984),还是张美兰主编《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汇刊》(2011)、李无未主编《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2015)和最近出版的余跃龙编著《近代汉语官话方言课本文献集成》(2023),都没有言及武藤文库里的这三种北京官话抄本,只有罇澤彰夫(2018)在研究日本明治时期中文教育史重要人物御幡雅文时介绍了这些资料。不过罇澤先生的论文并不涉及汉语本体研究,也没有对这三种资料的内容、语言等进行更详细的考察。

而从编写时间来看,这三种抄本的都早于《官话指南》等明治时期日本人编写的北京官话教材,处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语言自述集》—武藤文库三种抄本—《官话指

²⁰ 根据郭锐(2016)的定义,早期北京话指清中叶至民国时期的北京话。而本文所谓早期北京官话则指清中叶至民国早期官府口头语言,与威妥玛在《语言自述集》序言中所言 the oral language of Government 接近。当然这两者究竟是否有区别,尚需更细致、具体地研究。

南》等明治时期官话教材、《小额》等小说”这样一个时间链上。再加上三种手抄本都是中国教师编写的，与非母语者编写的教材等资料不同，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另外，武藤文库的这三种抄本还有一个特点是足够大的语料量。《绍古》两册大概估算六万字以上；《志白》两册有十八万字左右；《今古》有六个故事，但不可翻页处多，大致也有三万字以上。这样的语料量一般教材难以企及。《语言自述集》虽然是大部头，但其实中文文本部分只有散语章 40，问答章 10，谈论篇 100，长文故事 1 篇。金国璞《北京官话 今古奇观》四个故事，6 万字左右（张美兰 2024）。其他明治时期教材多以实用为目的，要求使用、携带便利，篇幅都不大。

最后从语体来看，三种手抄本有对话类，也有短文类。内容除了日常交际对话，还有较长的关于政治、历史、习俗等的介绍。比如《志白》讲述清朝与边疆民族的各种交往、历史事件的篇幅相当大。在长篇叙述、内容又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会出现更多篇章、话题连接或转换手段，是考察篇章语法的难得语料。

至于研究内容可以包括用字、词汇、语法和语篇。下面从用字、词汇、语法方面各举一个例子。

比如“那”和“哪”的使用情况。三种手抄本里疑问词 which 和 where 都用“那”，即“那+名词”、“那里”，而“哪”仅用于句末，是语气助词。如²¹：

(3) 甲：府上是在那儿？

乙：舍下在前门外茶食胡同。（《绍古》乾 1-a-4）

(4) 若是这么着，吏部之后该当那衙门值日呢？（《志白》乾 5-a-11）

(5) 今天好大风哪。（《志白》乾 18-b-5）

(6) 贵衙门是忙得很哪。（《绍古》乾 1-a-6）

例（3）询问处所的疑问词“哪儿”写作“那儿”；例（4）询问“哪（个）衙门”也写作“那衙门”。可见当时并没有写作“哪”的疑问词。“哪”用在句末，是语气助词，如例（5）和例（6）。“那”和“哪”的使用区分，是 1919 年以后的事了（凌远征、吴嘉谟 1992；胡习之、高群 2024）。这些资料也是很好的佐证。

词汇方面举一个词的色彩义变化的例子。如例（7）《志白》乾 1-b-10 的这段对话。乙是一位生活在北京的英国人，他来到认识的中国人甲家里，请甲帮他找一个家庭教师，教他中文。乙说想请一位先生教他读庄子，甲告诉他读古典的老师不好找：

(7) 乙：难道这样偌大的北京城，就没有看古书的么。

甲：岂有此理。阁下这个话未免轻看我们北京人了。有是有，不过少就是了。

“岂有此理”在现代汉语里，是“对不合理的事表示气愤”（《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1027）。但是在这个对话里，从两人身份来看，此处的“岂有此理”仅相当于今天口语里的“哪能呢、怎么会呢”。也就是说这儿的“岂有此理”就是“哪里有这样的道理”这一基本词汇义，而并没附加“气愤”的感情色彩。

²¹ 以下引用例句均标出书名、页数及起始列，如《绍古》乾 1-a-4，表示该例在《绍古》乾册第 1 页右半、第 4 列始。

语法方面值得关注的问题也非常多,比如疑问句、比较句、“给”的用法及句式、补语标记“得”的使用情况、助动词、介词、指示词、人称代词、语气词等。以疑问句为例,考察《志白》前三十章的非特指问形式后发现,极性问以“S+么?”形式最多,不见“吗”²²,如“请问,这值日有一定么?/刘兄昨天没对阁下提什么事么?/除了这八位之外还有么?”等。也可以看到“V(0)不V”的例子,如“阁下看报中的意思明白不明白?/先生请看知道这两样东西不知道?/可以有什么法子没有呢?/是这样不是?”。但是仅以前三十章来看,这样的问句形式少,动词主要是静态动词,包括判断动词、领有动词和理解类心理动词,动态动词不见。此外还有“S,是不是?”问句,如“每固山作为一营是不是?”、“NP呢”问句,如“不去的呢?”而选择问形式则至少有三种:是A,还是B?、还是A哪/呀,是B呢?、是A是B?不一一举例。

再看一个社会语言学的例子。初次见面的人如何打招呼,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语言现象。《绍古》最开始的几句是这样的:

(8) 甲:请教尊姓?

乙:岂敢。贱姓文。

甲:尊行?

乙:行二。

甲:文二兄。

乙:岂敢。贵姓?

甲:贱姓章。

乙:尊行?

甲:行五。

乙:章五兄。贵处?

从这个对话可知,当时初次见面,不是问姓、名,而是问姓和兄弟姐妹中的排行,然后称呼对方为“姓+排行+兄”。而在《官话指南》(吴启太、郑永邦著,明治14年)里初见面的两人是这样打招呼的:

(9) 你纳贵姓。

贱姓吴。

请教台甫。

草字资静。

再到《华言问答》(金国璞著,御幡雅文抄于明治20年)²³是这样的:

²² 根据大岛吉郎(1992)的研究,《红楼梦》程甲本(1791)已有“吗”,大多用于对话中,如:①袭人冷笑道:“你问我,我知道吗?”/②那丫头道:“……。就便回来有人带信,不过口里答应着,他肯给带到吗?”/③便心中突然想起:“常听见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吗?……”这些例子都还不能说是典型的是非问。例①是反问,例③是推测,而例②也有些反问的意味,这一研究显示疑问助词“吗”最早可能是用于反问句末的语助词。全面考察武藤文库这些早期北京官话资料应该可以帮助了解这一问题。

²³ 这个版本的《华言问答》是御幡雅文明治20年(1887)3月在熊本时抄的。电子版参见関西大学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https://www.iif.ku-orcas.kansai-u.ac.jp/books/ma-x071#?

(10) 掌柜的贵姓啊。

岂敢，贱姓李。没领教您纳。

我贱姓周。您贵处。

又不同。当然，这可能跟对话双方身份有关，但是如果考察明治时期各种官话课本的这种初次见面的语言，应该可以看到这种社交语言的规则 and 变化，也是很有意思的。

4.1.2 翻译小说的欧化语法问题

所谓欧化的语法，是指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语法（王力 1985：334）。最早对此有论述是王力先生。他在 1943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法》中以《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语言为对照基准，指出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了一些不同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传统语言的表达形式，这些表达主要是受英语影响而来。他主要指出了六种表现：1. 复音词的创造；2. 主语和系词的增加；3. 句子的延长；4. 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5. 联接成分的欧化；6. 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王力 1985：334-373）

按照王力先生的看法，欧化的语法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影响。但是清末其实已经出现北京官话翻译的白话小说，比如上文提到的英语宗教小说《天路历程》的翻译。那么从早期北京官话翻译小说中，是否能看到这样的欧化句式呢，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拿并列结构来说，王乐 (2024) 考察近现代白话报刊语料后认为，1815-1898 的白话报刊中几乎不见并列结构的使用，1898-1931 年白话报刊逐渐出现并列结构，主要见于五四运动后文艺副刊上的翻译小说、原创小说。有 6 类：谓语并列、主语并列、宾语并列、定语并列、状语并列、补语并列。这一时期的并列结构具有试验性、不稳定的特点。1931 年以后才逐步稳定，并分化。武藤文库里两种版本的《官话天路历程》，是与王乐 (2024) 的研究完全不同的语料，对其进行考察能补充、完善现代汉语源头的欧化语法问题。

4.2 中文作为外语的教学研究角度

鯨澤彰夫 (2018) 在研究日本明治以来中文教育史时，专门提到明治时期中文教育官话转型期的御幡雅文，指出他在商务汉语方面的开拓作用。六角恒廣 (1999) 也设专章介绍了御幡雅文的生平和在汉语教育方面的贡献。但关于他有三种在北京留学期间的手抄本教材存于武藤文库，仅有鯨澤彰夫 (2018) 作过简单介绍，尚未见深入研究。这些资料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了新的研究可能。

4.2.1 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

与御幡雅文有关的这些资料忠实地反映了日本明治初期北京官话教育的历史面貌。比如《志白》的人物设定，为何学习者设定是英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是否能推测这本教材原本是为英国学习者编写的，而这位教英国人的教师同时又在日本的北京公使馆教北京官话，在没有针对日本人的教材的情况下，就直接拿过来用了。这是很可能的。

另外，从这一点可以管窥到当时英国的北京官话教学是走在日本前面的这一事实。有一些侧面的证据也支持这一推测。根据楊鉄錚 (2018：41-42) 研究，日本的汉语教育在开始由南京话向北京话的转折期，特别在北京公使馆开始教授北京话的时候，曾发函向英国、德国公使馆询问过中文教育体系、考试情况等，现在外交史料馆还可以看到英国公使 Walter. C.

Hillier (1849-1927) 和德国公使 Clemens August Freiherr von Ketteler (1853-1900) 给日本公使盐田三郎 (1843-1889) 的回信。

明治初期北京公使馆的中文教育状况,如教育科目、考试内容等也可以从御幡雅文的这三本手抄本窥见一斑。明治 19 年 (1886 年) 北京公使馆对官费留学生进行了成立以来的首次学力考试,其中考试科目包括“官话问答、官话译题、京报训点”等 (杨铁铮 2018: 62)。

《志白》里读《京报》的内容直接反映在考试科目中,是这三种手抄本确为当时使用过的教材的最好证明。但是随着清政府的瓦解,这样详细讲解朝廷官员制度、典章、历史的教材内容也自然消失不见了。实用性官话教育逐渐转向商业和军事。

4.2.2 从学习者到教材编写者的身份转换研究

明治早期来北京留学的这些学生,日后大多活跃在日本中文教育舞台,不仅在日本各处教授中文,还编写了多种影响大的教材。御幡雅文就是其中之一,《华语跬步》是其代表作,影响也很大。而武藤文库这三种御幡雅文的学习笔记,提供了从汉语学习者到汉语教材编写者双重身份的资料。抄本的学习记录——各种红笔记号,比如为难字 (或生词) 注音、标注送气音和词 (或句) 重音、错字漏字的修正等,反映了御幡雅文作为学生学中文的注意点。而这些学习时的重点和心得,直接反映在他编写的教材里。《华语跬步》初版 (1886) 的单词、单句、散语类,都标注声调、标注送气、还特别注意标出重读。这些从他的学习笔记里都可以看到。

这种学习和教授的紧密联系也同样反映在内容上。考察《华语跬步》初版 (1886) 会发现²⁴,该书第 44 页出现了“京报”的话题,以“请问,怎么叫京报”为引子,从此处直到上册结束,都是介绍“京报”及读“京报”必须学习的清朝官府制度、衙门职能、各类官职等,这一部分能直接在《志白》找到源头。

学习者的学习策略,是否影响其作为教授者的教学方式,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但一般来说,这种历时的记录并不容易找到。御幡雅文的例子却能提供这样的研究资料。武藤文库里有保存完好的御幡雅文学习时期的学习笔记,而他编写的《华语跬步》等各种教材、各种版本都不难找到,这样的情况是不多见的。

五 小结

本文概述了长崎大学附属图书馆经济学部分馆贵重资料武藤文库里十九世纪末北京官话资料的基本情况。御幡雅文的三种手抄本《绍古先生口授京话》(两册)、《官话 志白问答》(两册)和《官话 今古奇观》是其 1879-1881 年在北京公使馆留学期间,跟随旗人教师学习北京官话的课本,也是他的学习笔记。《绍古先生口授京话》和《官话 志白问答》是对话体,内容除了日常交际对话,还包括对清朝官府各衙门、科举、祭祀、婚丧习俗的介绍,甚至清朝历史上与边疆各民族的交往与战争、当时的政治时事等均有涉及,内容的厚度和深度非明

²⁴ 《华语跬步》初版为明治丙戌夏月 (明治 19 年),封面题签上写着「崎陽揮肅先生著」,扉页写有「瓊浦揮肅未完稿」。「瓊浦、崎陽」是长崎别称,“揮肅”则是御幡雅文的号。

治时期日本中文教材可比。《官话 今古奇观》是长篇故事，内容与金国璞《官话今古奇观》（1904、1911）完全不同，且较之早了二十多年。不过此书虫蛀、劣化相当严重，近一半已经无法翻页，阅读困难，需要修复。

武藤文库所藏御幡雅文的这三种手抄本在时间上介于《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小额》之间，作者均为清末旗人，语言是典型的北京官话，且文本量大，是早期北京官话的研究的重要资料。另外，三种手抄本中有御幡雅文学习时所做的各种红笔标注，包括同音字注音、送气音、词或句重音、断句、词语解释、修正等。这些学习笔记的注意要点，部分地反映在其后编辑出版的中文教材里。这也成为中文第二语言教育研究的宝贵资料。

武藤文库所藏英国宗教小说《天路历程》的最早官话译本有 1892 年天津华北书会版和 1919 年上海美华书馆排印本两个版本。两版均为 5 卷，但版式不同，主要表现在是否有插图、如何进行注释上。具体内容上的差异尚未考察。此外，武藤文库还有《续天路历程官话》全 6 卷，1905 年上海美华书馆排印本。早期宗教小说的北京官话译本，对研究欧化语法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陈平原 2003. 晚清教会读物的图像叙事，《学术研究》第 11 期：112-126 页。
- 郭锐 2016. 早期北京话的语言研究价值——“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序，载刘云著《早期北京话语法演变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 胡宇之、高群 2024. “哪”作为疑问代词书写规范的形成与确立，《中国语文》第 5 期：630-637 页。
- 李无未主编 2015. 《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戸明治编）》，北京：中华书局。
- 刘云 2018. 《早期北京话语法演变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凌远征、吴嘉谟 1992. “哪”字的由来，《语文建设》第 3 期：6-8 页。
- 王力 1985. 《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乐 2024. 近现代白话报刊并列结构的发展——兼谈百年来汉语书面语体的再生，The 3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延世大学·首尔：p.325。
- 吴文南 2008. 英国传教士宾为霖与《天路历程》之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武春野 2011. “北京官话”与书面语的近代转变，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余跃龙编著 2023. 《近代汉语官话方言课本文献集成》，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美兰 2024. 文本比较下的早期北京官话句式的地域口语特征——以《北京官话今古奇观》为例，《中国语言学报》21 期：108-126 页。
- 张美兰主编 2011. 《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汇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廷彦、田中庆太郎 1905. 《官话文法》，东京：救堂书屋。
- 樽本照雄 2002 《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济南：齐鲁书社。
- 井上哲次郎著、島藺進・磯前順一編纂 2003 『懷旧録、井上哲次郎自伝』東京：クレス出版

- 殷 晴 2018 「清代における邸報の発行と流通--清朝中央情報の伝播の一側面」 『史学雑誌』 127 卷 12 号 : 1-38 頁
- 内田慶市、氷野歩、宋桔編著 2015 『語言自邇集の研究』 東京：好文出版
- 大島吉郎 1992 「《紅樓夢》における‘嗎’と‘麼’について—庚辰本と程甲本の比較を中心に」 大東文化大学外国語学会『外国語学会誌』 第 21 号:1-20 頁
- 竹内好 1941 「支那語について」 『中国文学』 第 78 号 : 425-427 頁
- 何盛三 1928 『北京官話文法』 東京：太平洋書房 （関西大学アジア・オープン・リサーチセンター 1935 年版 <https://www.iif.ku-orcas.kansai-u.ac.jp/books/2096#?page=104> ）
- 中田敬義 1942 「明治初期の支那語」 『中国文学』 第 83 号 : 11-20 頁
- 波多野太郎編・解題 1984 『中国語学資料叢刊・白話研究篇』 東京：不二出版
- 波多野太郎編・解題 1985 『中国語学資料叢刊・燕語社会風俗官話翻訳古典小説・精選課本篇』 東京：不二出版
- 波多野太郎編・解題 1988 『中国文学語学資料集成』 東京：不二出版
- 鯨澤彰夫 2018 「新しい時期区分による明治以降中国語教育史の研究」 早稲田大学博士論文
- 鯨澤彰夫 2024 『中国語教育史の新研究』 東京：好文出版
- 六角恒廣 1984 『近代日本の中国語教育』 東京：不二出版
- 六角恒廣 1988 『中国語教育史の研究』 東京：東方書店
- 六角恒廣編・解題 1991 『中国語教本類集成』 東京：不二出版
- 六角恒廣 1999 『漢語師家伝——中国語教育の先人たち』 東京：東方書店
- 楊鉄錚 2018 『明治期中国語教育における伝統継承と近代化: 金国璞、張廷彦と『官話指南』を中心として』 東京：両風堂
- F. L. Cross, ed. 1983.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 R. Owens 2003. *Oxford World's Class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 Bunyan 1678. *The Pilgrim's Progress*, W. R. Owens, ed. 2003. *Oxford World's Class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 Overview and Research Prospects of Early Beijing Mandarin Materials in the Muto Bunko Collection

ZHAO Kuixin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outlines the early Meiji Mandarin materials held by the Muto Bunko at Nagasaki University, and examines their value and potential for research on Mandarin and Chinese education as a foreign language. It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wo types of early Mandarin materials in the Muto Bunko, and endeavors to clarify their contents, various symbols, and related

circumstances: 1) Three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Mandarin textbook by Obata Masafumi: *Shaogu Xiansheng Koushou Jinghua* (2 volumes), *Guanhua Zhibai Wenda* (2 volumes), and *Guanhua Jinguqiguan* (1 volume). 2) Two Mandarin translations of the religious novel *The Pilgrim's Progress* and a Mandarin translation of its sequels. The manuscripts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they were created before 1881; compiled by Manchus and having a large amount of data. They are valuable materials for diachronic studies of Mandarin.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worth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te 19th century Mandarin translations of English novels and the Westernised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Keywords Muto Bunko; 19th Century Beijing Mandarin; Chinese Textbooks; Early Meiji Period;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